

# 武大藏本《事类赋》两跋辨伪

廖源兰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刻三十卷本《事类赋》一部,题宋博士渤海吴淑撰注,黑口、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书前有宋边惇德序,其次有吴淑《进注〈事类赋〉状》,卷三十后有“宋绍兴丙寅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嶽庙边惇德;左儒林郎绍兴府观察推官主管文字陈绶;右从政郎充浙东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李端民校勘”三行字;书末有赵子昂、王穉登用毛笔题跋各一条。书前及各卷首页钤有“冯梦祜印”、“冯氏开之”、“祕府”、“毛氏珍藏图书”、“自天水人”、“红术山人”和7.5×7.8cm大方印(印文待认)等印章。《事类赋》宋、元、明、清各朝均有刻本,但明刻本存世很少,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征求意见稿)载全国仅存七部。《事类赋》作者吴淑,字正仪。生于南唐保大五年(947),卒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初仕南唐,入宋后官至职方员外郎。

《事类赋》赵子昂跋:“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①气,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子昂识。”并钤有“赵氏子昂”、“天水郡图书印”(天水郡为赵姓郡望)两方朱印。

赵子昂名孟頫,号松雪道人,斋堂号为松雪斋。系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由行台御史程钜夫举荐而仕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王穉登跋:“宋本书往往见于藏书及好事之家,欲其精善完好若此本者绝少。此本纸墨侵摹并出良工之手,政与琅琊长公所藏《汉书》绝相类,《汉书》有赵魏公小像,此书有公手书,二书皆公邨架中本也。流传至今仅三百年,而卷帙宛然,既免蠹②鱼之腹,又不落雌黄之手,岂灵籙祕笈神物呵护之耶?今归朱司成象玄家,出示谛赏因漫题此。此本视《汉书》亦犹蜀得其龙,吴得其虎耳矣。万历甲戌人日王穉登书。”并钤“穉”、“登”两方小印。

王穉登,明武进士,移居吴门,字伯穀。十岁能诗,名满吴会。王穉登曾拜于文徵明门下,遥接其风,擅于诗词,嘉、隆、万历间在吴会以穉登为最。万历中徵修国史,未上史局而罢,卒年七十余。

明刻本《事类赋》已经十分难得,如果赵、王二跋确系真迹,此书当为国家瑰宝且价值连城。因此,《事类赋》及赵、王二跋向为学者所重视。近人湘阴徐廷麟题:“宋本《事类赋》(徐误认为宋本),此本前之序、状、后之校勘题刻,彰彰可考。而卷尾赵文敏一跋尤为宝贵……。庚戌(宣统二年[1910])十月徐廷麟勤轩父识。”(用信笺题写贴于书首)徐充分肯定了赵跋,然而武大图书馆的老前辈们于1937年和1960年进行了两次考证,特别是1960年的考证指出:“……而赵王二跋字体不佳,疑为书贾伪作宋刻……。”显然是不同意徐廷麟的看法,但仅限于从印鉴、字迹来考证,未能提出充分理由。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辨析,现求教于识者。

**一、内容考证** 跋语的真伪,从内容上辨析最为重要。赵跋主要内容是夜读阮嗣宗《咏怀》诗有感。阮嗣宗即阮籍,字嗣宗,生于魏晋之际。“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沈约语)这是阮氏《咏怀》诗格调忧伤原因所在。赵子昂作为宋太祖第十一世孙,入仕元朝,虽得元世祖忽必烈钟爱,但也受到右丞相叶李、丞相桑哥等人中伤,在处境上与阮氏有某些相似之处,夜读阮诗引起思想共鸣是很自然的,加上该书纸墨侵摹皆精,因而助了他吟诵之兴。由此观之,赵氏跋语应当题在收录阮诗的刻本

上。赵跋说得很清楚：“是书玉楮银钩”。“是书”就是指他所读的载有阮诗的书，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书。如前所说，《事类赋》是一部赋体类书，与阮诗无关。赵氏读了阮诗将感想题在与阮诗无关的《事类赋》上，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一般也是不可能的。经查清乾隆间编的《天禄琳琅书目前编》收录有宋本《六臣注文选》（下称《文选》）。而《文选》载有阮嗣宗《咏怀》诗十七首。该书有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多人题跋，其中也包括赵、王二人。在其他人的题跋中，几乎都提到赵、王二跋。乾隆皇帝跋识说：“此书董其昌所称与《汉书》、《杜诗》鼎足海内，在元赵孟頫、在明王世贞、王穉登……俱有题识。”张凤翼跋：“……且其间有赵文敏识数语，则知此书常入松雪斋中。”汪应娄跋：“宋版《文选》人所罕觐者，纸精墨妙居然完璧，末有赵文敏公所书数行，是为松雪斋宝藏者。”以上诸跋都证明松雪斋主人赵子昂曾经收藏过宋版《文选》；且赵、王二人确实在《文选》中题过跋；同时也证明宋本《文选》纸精墨妙，与赵跋中“是书玉楮银钩”、王跋中“本书纸墨侵摹并出良工之手”的意思相吻合。

《事类赋》的赵跋与《文选》完全相同，王跋只差一字。《文选》王跋首句为“宋本《文选》”，当然是指所题跋的本子，即后为《天禄琳琅》所收的宋刻本《文选》；《事类赋》王跋首句是“宋本书”，可以理解为宋刻本《书》，或者是宋刻的一切书籍的通称。但从整个跋的内容来看，既不是指《书》、也不是泛指一般宋刻书，而是指所题跋的书。跋语制作者之所以将“文选”二字改为“书”，正说明是从《文选》中抄袭而来，《事类赋》非《文选》，如果原封不动的抄袭，很容易露馅，只好将“文选”改为“书”字，以掩人耳目罢了。殊不知这样做也仍然露出抄袭痕迹。一字之改足见其伪。

**二、时间考证** 时间是否确切，也是考证该跋真伪的关键。《事类赋》赵跋写于元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即公元1342年。据《元史》及《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等有关资料记载，赵子昂已于元至治二年六月即公元1322年六月卒。距离题《事类赋》跋已去20年，绝不可能赵死了20年还能题跋的道理。就这点足以说明《事类赋》赵跋并非真迹，而是后人伪造的。《天禄琳琅目录前编》上《文选》赵跋的时间与此相同，因此也是错误的。《天禄琳琅》系清乾隆九年於昭仁殿列架藏置宋元善本书，乾隆皇帝题为《天禄琳琅》，乾隆四十年命馆臣于敏中等编制《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详记收藏家图识。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些宋元善本已于清嘉庆二年昭仁殿火灾时付之一炬，《文选》也未能幸免。因此现在已无法查对原书。《天禄琳琅书目》记载有误，笔者只能揣测，可能是由于馆臣于敏中等人在编制目录时，将皇帝年号搞错了。否则无法理解。

再从《事类赋》赵、王二跋在题跋时间上与《文选》完全相同，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绝不会将同一内容的跋语在同一时间内题在不同内容的两种书上。两个不同朝代的人，更不可能这样巧合。一般人不会一跋两题，更何况官至翰林承旨、一代书法宗师的赵子昂呢？

跋语制作者利用《事类赋》未刊刻版本、出版年之机，制作这两条跋语，造成悬案二百余年，一旦该书版本、年代弄清楚，这个悬案就迎刃而解了。《事类赋》的版本和年代问题经过几次考证，一说是元依宋翻刻本；一说是元末明初依宋刻；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经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专家验收小组（有魏隐儒、沈津等先生）鉴定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白磬刻本。这样说来赵子昂死后二百多年《事类赋》才出版，赵氏更不可能在上面题跋了。

**三、字迹考证** 赵子昂系元代大书法家，而且自成一派，影响深远，元、明两代刻书多崇赵体。今观《事类赋》赵跋字迹不佳，并非赵体。经行家鉴定，赵、王二跋出自一人之手，这就证明赵、王二跋系后人伪造并非真迹。

从内容、时间、字迹三方面来辨析，《事类赋》赵、王二跋于清乾隆以后清人抄袭《天禄琳琅书目前编》收录的《文选》上面的跋语。多系书贾为了提高书价，不惜假托名人而作的。

武大藏本《事类赋》赵、王二跋虽系伪迹，但仍不失其重要价值，在善本书中仍占有重要席位。

注 释：

① 《文选》作冷。

② 《文选》作虫。

（本文责任编辑 江 平）